

四川省志

人物志

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编纂
ANNALS OF SICHUAN PROVINCE

(下 册)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四川省志·人物志/秦安禄主编. —成都:四川人民出版社,2002.3
ISBN 7-220-05787-3

I. 四… II. 秦… III. ①四川省—地方志②历史人物—列传—四川省—近代 IV. K29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02960 号

Si Chuan Sheng Zhi·Reng Wi Zhi

四川省志·人物志

四川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编

责任编辑
特约编辑
技术设计
责任校对

聂运华
何瑞明
陶利辉 赵桂芳
伍登富

出版发行
网 址

四川人民出版社(成都盐道街3号)

<http://www.booksss.com>

E-mail: scrmcbf@mail.sc.cninfo.net

防盗版举报电话

(028)6679239

印 刷

成都飞机公司印刷厂

开 本

787mm×1092mm 1/16

印 张

63.4375

字 数

1080 千

版 次

2001 年 12 月第 1 版

印 次

200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

1—2800 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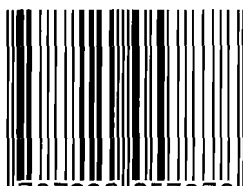
书 号

ISBN 7—220—05787—3/K·805

定 价

298.00 元

ISBN 7-220-05787-3



9 787220 057878 >

■ 著作权所有·违者必究

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工厂联系调换

文化界

刘 沅

刘沅,字止唐,生于1767年(清乾隆三十二年),卒于1855年(咸丰五年)。双流县人,后迁居成都。其父汝钦,精于《易》学,亦工诗;其兄刘濯,为清嘉庆进士,曾任工部主事、广西直隶郁林州知州,善诗、工书法。刘沅幼承庭训,博览群书。1792年中举,以后曾三次参加会试不中。1826年,选授湖北天门县知县。刘沅科场失意后,潜心于儒学,无心仕进,又因其母年迈多病,更不愿外出做官,遂改授国子监典簿,卜居成都奉母讲学,并从事儒家经典的研究。他教学成绩卓著,据清《国史馆本传·刘沅传》载:“著弟子籍者前后数千人;成进士登贤书(中举)者百余人;明经贡士三百余人。……贤名播于乡曲者指不胜屈。”

在长期从事对儒家经典的教学和研究中,刘沅“解经尽除门户之见,不苟异

同,务求当于经义。”力图将儒学从繁琐哲学中解放出来,恢复其本来面目,使“圣人成己成人之道不至淹没”。刘沅认为,“文学传说愈多,圣道弥晦”,真正的圣道圣学在汉代以后,已被弄得面目全非,“唐以后言道者始益支离”。因此,刘沅除按自己的观点对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进行了详细的注解外,还对一切他认为不合孔孟原旨的思想言论,都加以辨正,以“辟流传之误”。在他撰写的《正讹》一书中,对唐代以来的著名儒学大师韩愈、周敦颐、张载、邵雍、程颢、程颐、朱熹、王阳明等人的主要著作都加以评论,凡认为不合孔孟思想真义之处,则加以驳斥,并阐明自己的不同看法,提出了许多独立见解。他还以儒家之说为准则,对佛、道之言不是一概排斥,凡与儒学相一致的地方则加以肯定。他说:“吾以圣

人之道定百家,不以百家之谬溷圣贤”,“以中庸之道折衷百家,以圣人之书权衡杂术”。并认为排僧道之所为是应该的,但排佛老学说则是错误的。刘沅的学术思想体系,虽仍未越出宋明理学之范围,但在许多方面能广取各家学说之长而力避其短,视野开阔,自成一家之言。

刘沅一生著述宏富,在哲学、经学、文学和史学诸方面均取得一定成就,其中哲学思想尤为丰富。刘沅的宇宙观基本上是以“太极”为本体的客观唯心主义,但也包含有一定的唯物主义因素。他认为形成宇宙万物的本源是“太极”,并认为老子的“道”就是“太极”。“太极”是浑然无形、无始无终、无臭无声的,是阴阳的本体,处于无限运动的过程中;而阴阳五行是具体的、有限的,其消长变化是由“理”来主宰,又是由“气”的流行来实现的。事物运动变化的根本原因是一种“神而莫测”、“能妙万物”的精神力量。但刘沅又把“气”作为天地万物之本源,他说:“天生万物,而所以生万物者,天之为皆乾元一气之所为。”他还以辩证的观点论证了理气、有空、虚实、动静之间的关系。

从上述宇宙观出发,刘沅认为人性是天赋的,天赋的人性是善的。他说:“天之理赋于人为性”,“性,天理而已,天理无不善,人得之以为性。”但他又认为人出生后人性就不纯了,只有圣人才能保全天赋的善性,因此人人都要躬行圣学圣道,修身养性,才能恢复先天的善

性。他综合儒、佛、道三家的修养方法,提出了一套以儒家的道德规范为准则,兼及佛道的“存理去欲”、“存心养性”的修养论。其具体方法就是“静存动察”的“内外交修”,以静制动,以性制情,如果一念不善,就必须将其克制于萌芽状态中。

刘沅在认识论上也含有一定朴素辩证法思想。在知行问题上,他反对先知后行,主张知行一起俱到。他说:“知者所以为行,能行则知益真。”在认识的来源上,他认为:“闻见之知,耳目之官也;德性之知,心之官也。”“心之官与耳之官是一是二。物交物者,不知养性,心官失其主而耳目亦蔽也。”对感性认识(耳之官)和理性认识(心之官)之间的辩证关系也有所认识。

刘沅的社会历史观基本上是天命论支配下的唯心史观,但其中也有合理因素。如他在评论东汉光武帝刘秀时,一方面说:“从古拨乱之君,莫不皆由天授。”但又认为:“光武起于布衣,温良谨厚,大度知人,岂秉资异?亦其平日之所居游,观摩有素耳!”承认杰出人物的才智是从后天的实践中得到的。他对商鞅变法也作了一定程度的肯定,认为商鞅“废封建、开井田,未可全非也。”

刘沅对中医学也深有研究,精通中医典籍并极善养生。清代蜀中著名伤寒学家、被尊为火神派首领的郑钦安曾受教于刘沅门下。

刘沅的学术思想被称为“槐轩之

学”，不仅在四川影响很大，省外亦有所传播。清《国史馆本传·刘沅传》说：“咸丰中，侯官林鸿年为云南布政使，至蜀得沅书，读之惊喜。求问时，沅已死，因受业于沅弟子内阁中书刘芬，尽购其书去。及罢官归，遂以其学转相传习，闽人称为川西夫子云。”清末四川保路运动的代表

人物之一的颜楷，亦服膺其学，并以槐轩门人自居。

刘沅的著作生前曾陆续刊印成单行本行世。后由子孙及门人集资，汇集刘沅选著 23 种，加以校订，编成《槐轩全书》，刻印发行。

唐宗海

唐宗海，字容川，生于 1846 年（清道光二十六年），彭县三邑乡人。唐宗海出生后，家道渐衰。稍长，赖其母艾夫人替人针黹，供其就学，先从广汉李本生习文，后复从新都王利堂习理学。王治学甚严，且学识渊博。唐宗海聪敏好学，刻苦勤奋，由是学业精进。1862 年，入泮为秀才。1868 年，他鉴于“先君子体羸善病”，深感为人子者不可不知医，而开始“涉猎医书学”。因感医书充栋，检校茫茫，乃取前贤诸书，总其切要，提纲挈领，于 1869 年著成《医柄》一书。后期撰有《医学一见能》，皆是适用于民间之医学书籍。

1873 年，其父唐瑞麟患血症，多方求治无效，延六年而卒。唐宗海深感未早悟医道，由此潜心攻读“血证”。1879 年，其妻冯氏亦患血疾，经他精心调治而愈。

唐宗海受当时新思潮影响，怀着“值

古今大变局时”，“以文章报国”之初衷，从 1873 年至 1884 年，凡 11 年，写成《血证论》8 卷。他在该书《序》中写道：“议论多由心得，然其发明处要皆实事实理，有凭有验。”是书集血证诊治之大成，创止、消、宁、补之要法，精辟独到，至今仍不失为临床医家研究血证及活血化瘀之有效医书。此书一出，名闻西蜀，以致居家授徒时，“列门下者，恒数十人”，声誉远播。“乡邻病者则求之，病剧者，中夜叩户，披衣辄往，未尝告倦”，且不计资酬，稍有积蓄，亦以周济亲族、邻里。

1885 年，唐宗海乡试中举。1888 年游学江南，秋季达沪，与夔门邓云笙、云航兄弟交，以医术扬名于沪上，每有疑症问之，辄对答如流。凡人身脏腑经络，相生相克之理，无不通晓；其谈三焦，更能发人所未发；医不能疗者，一经唐宗海诊治，沉痾顿除，人俱惊为神奇，以其医术之精湛，备受推崇。

1889年,唐宗海中二甲进士,授礼部主事。同年,其妻冯氏卒,遂告假归里。翌年春,赴彭县敖场凤楼书院,求教于《易》理造诣极深的川中名儒吕调阳,攻读《易经》,在医理中考证三焦,又撰成《医易通说》。用《易经》解释医理,以之“为医学探源,为易学引绪”,期求将易学与中西医贯通。后唐宗海侍奉母亲赴北京,将所著《血证论》出示于众,医者皆折服,京城友识求诊者络绎不绝,由是医名大噪。此后,唐宗海寓居上海,从事医疗活动和医学著述。这一时期,他与浙江陆润庠(同治年间状元)相互讨论医学、医案的往来书信达200余封,其中有多篇形成医学文章,刊载于陆在杭州主办的《医学导报》上。

自西医传入中国后,国内医学界中一派推崇西医而否定中医,而另一派则崇尚中医,视西医为异端邪说。唐宗海认为,西医初出,详形迹而略气化,中医略形迹而详气化,各有所短亦有所长。力主汇通中西,厘正医道。他摘灵素诸经,录其要义,兼中西之说解之,以中国古代医学理论为基础,吸取已输入我国之西医解剖、生理学等知识,并采用西医之解剖图,撰成《中西汇通医经精义》2卷,于1892年刊行(初名《中西医判》)。该书分人身阴阳、五脏所属、血气所生、脏腑为病、诸病所属、望形察色、诊脉精要、审治处方等28节,为中国最早汇通

中西医学的一部著作;次年,唐宗海又撰成《本草问答》2卷、《金匱要略浅注补正》9卷刊行于世;1894年,所撰《伤寒论浅注补正》7卷亦刊出。以上4种书,加上《血证论》,于同年由衰海山房辑成《中西汇通医书五种》丛书刊出,阐述了在中医理、法、方药上的汇通思想,是唐宗海的医学代表作。他力图把中西医统一起来,开创和促进中西医之结合。唐宗海之说,首倡一帜,学者应之,如朱汶文、张锡纯、恽铁樵等,形成中西(医)汇通派。唐宗海是中国中西医汇通派的先驱和代表人物之一。他的医学著作,除上述诸书外,尚有《六经方证中西通解》和《痢症三字诀》等。唐宗海著书立说的宗旨是“医人不如医医”,著作多裨实用,行销海内外,医名亦远播东南亚一带。

1892年以后,唐宗海往返京、沪、粤间。在京与刘光第等人交厚。1896年,授广西来宾知县,侍母由沪溯江而上,欲经鄂、湘入桂,适抵武汉而母病,遂停顿于此治病,旋其母卒于武汉。翌年,扶母柩穿三峡回川,抵万县,弃舟登陆,取道梁山(今梁平县)、大竹返乡。值川东疫病流行,唐宗海染病,抵家已不能言,10天后病逝,葬于双流袁家坝。

唐宗海生前曾在家乡三邑创办“农桑会”,并于故里近处租地约60亩,以兴农植桑,至今乡人尚传为美谈。

孙桐生

孙桐生,字筱峰,号痴道人,忏梦居士。生于1824年(清道光四年),卒于1908年。绵州(今绵阳市)人。其父曾任湖北黄安知县。孙从小博览群书,聪颖过人。1851年乡试中举,次年进京会试中进士,选翰林院庶吉士。1853年散馆,派任湖南安仁知县(未到任)。当年及1855年湖南两次乡试,孙桐生均任第一房同考官。他唯才是举,所选拔的13人中,黄锡焘、王先谦、唐村南等人随后都以文章、功名显赫于世。

1857年,孙桐生调任湖南酃县、安福等县代理知县,他悉心治理、安抚士民,一改过去混乱局面,使百姓安居乐业。桃源县地方恶霸为患,孙桐生奉调前往,他“到任后,按律正法数人,杖毙十余人”,使当地歪风恶习有所收敛。1869年,孙桐生奉调为永州府试用知府,他因秉公执法而得罪上司,终被降职调岳州榷局。1880年他又调任郴州知州,郴州地方豪强凶悍嚣张,竟然杀掉过三任州官。孙桐生到任后,惩治顽劣之徒,政绩卓著,深受百姓称道。

孙桐生在湖南任上时,结识了刘铨福等一批早期红学家。刘收藏有1754年的《脂评本》(即《甲戌本》)和“妙复轩”的抄本,1866年孙桐生从刘手中得到《妙复轩评〈石头记〉》抄本并将其带到湖

南卧云山馆反复研究整理,“逐句梳栉,细加排比,反复玩索,寻其义,究其归,如是者五年。”后又私人出资,于1881年刊刻印行,题名《妙复轩评本·绣像石头记——红楼梦》。

1867年夏,孙桐生又从刘铨福处借回脂评甲戌本《脂砚斋重评石头记》,详加研究,并在上面留下40多条评语和批注,这是为胡适在“红学”研究中所认定了的。孙桐生认为《红楼梦》是以康熙年间武英殿大学士纳兰明珠家的事为模型而写的。他在《妙复轩评〈石头记〉》叙中列出了不少证据,作为此说的佐证。他的观点属于旧红学中的“索隐派”,对后来蔡元培研究《红楼梦》产生过影响。

孙桐生整理、刊行《妙复轩评〈石头记〉》,旨在推崇《红楼梦》。他说:“少读《红楼梦》,喜其洋洋洒洒,浩无涯矣,其描绘人情,雕刻物态,真能扶肺腑而肖化工”。他“以为文章之奇,莫奇于此而未知其奇也”。孙桐生刊行《妙复轩评〈石头记〉》的动机是“以备他年剞劂之用,庶不没作者、评者一番苦心云尔。”

1882年,孙桐生从湖南卸任回到绵州,正值治经书院落成,他主动担任主讲,对学生“讲道论德”,以砥砺其操修,使其“处为良士,出为良吏。”他担任治经书院主讲10年,大兴绵州学风,培养了

不少人才。

孙桐生一生著述颇丰,计有:《未信编》及其继编和余编、《永鉴录》、《永州府署题名记》、《彬鉴录》、《彬案日记》、《湘中时政记》、《国朝全蜀贡举考要》、《卧云山馆文钞》等 10 余种。他还收集、整理

编刻了《辑选明臣奏议》、《国朝全蜀诗钞》等,校刊了《牡丹亭》、《弹指词》、《忆旧词》、《妙复轩评〈石头记〉》等书。其中《国朝全蜀诗钞》是研究清代四川文艺史的重要文献。

胡 峻

胡峻,字雨岚,别号贞菴。华阳县(今成都市)人,生于 1869 年(清同治八年)。1891 年中举。1895 年入京会试中进士,选翰林院庶吉士。1898 年授翰林院编修。在京任职期间,胡峻结识同乡京官刘光第、杨锐及乔树枏诸人,受其变法维新思想影响,致力于探求革新时政之道。

1899 年,胡峻奔父丧返蜀,当局聘主少城书院,因守制未就。蜀中弟子慕其名,“皆愿执贄请业”,胡峻乃设家塾开馆授课。1902 年,川督岑春煊开办四川省城高等学堂,由于该校是当时全川最高学府,总理(校长)一职,必须由资深望重、学行兼优的人担任。岑春煊看中了丁忧在籍,其学识与为人均为士林所推重的胡峻,特三诣其门,敦聘主持高等学堂。值胡峻守制期满,正拟入京复职,但因他对教育极为重视,认为:“一国之治乱,系乎人才之盛衰;而人才之盛衰,视乎国家之教育。”且痛恨科举制度埋没人

才,于是毅然出任高等学堂第一任总理,担负起创办四川近代第一所文理兼备的综合性高等学校的重任。

1903 年 2 月,胡峻正式到高等学堂视事。以书院改学堂,事属创举,无成规可循,为了吸取国内外办学的先进经验和方法,胡峻通过岑春煊奏请于朝,被特派为考察日本学制游历官,东渡日本考察学务。在历时 4 个多月,对日本教育行政、学制规则、学科程级等,皆一一细心考研;对其国力、民情、局势也处处留心。同时,还为学堂聘请东洋(日本)教习,购置仪器图书。回国后,胡峻又到京师大学堂仔细考察了各项教学、科研和管理等措施。返成都后,他立即就考察所得,斟酌损益,亲手编定高等学堂各类规则及章程课程,延聘名师,从建筑校舍到设备、教具、图书等莫不精心筹划,巨细靡遗。经不懈努力,1903 年 11 月学堂开学,1904 年 3 月,正式举行了开学典礼。

新创立的四川高等学堂,成为全川学校的楷模和先导。各州县派人考察、参观、见习的人络绎不绝,胡峻“无不披沥相告,导以法程。”考虑各州县小学无所示范,又设立私立第一小学堂,以开风气之先,并集合同人设教育研究会,以讲求教育管理之得失。从而对全川各级新式学堂的开办和发展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。

胡峻任四川高等学堂总理期间,励精图治,以培养高级人才和中等以上学校师资为目标。由于名师荟萃,学风优良,经费充足,设备完全,加以对学生的考核及各项规章制度都十分严格,高等学堂(包括附设的中等学堂)先后培养了大批人才。

1903年9月,新任川督锡良到任后,对胡峻深为倚重,视为不可多得的人才,所推行之新政,多与咨谋并采纳其议。1906年,锡良延聘胡峻为全省学务公所议长,主持全省学务。到1907年,四川共有各类学校7775所,居全国第二;学生人数24.2万余人,居全国之首。

其时,帝国主义对四川铁路权虎视鹰瞵,使四川人民无比愤慨。锡良鉴于四川民情激昂,力主川路自办。1904年1月,官办川汉铁路公司在成都设立。次年1月,胡峻被任为公司总董,在酌定各种条章时,他以先杜绝外款为宗旨。鉴于路款筹集困难,又提议仿湖南租股办法,以租股为主,辅以官股、商股。锡良采纳其议,由公司拟定筹款集股章程

55条,采“内地集股,仿捐输而行债票”的办法,由四川人民集股办理。

1905年7月,川汉铁路由官办改为官绅合办,锡良奏派官绅总办各一人,绅总办先为刑部郎中乔树枏,不久即改派胡峻充任,并兼任铁道学堂监督(校长)。胡峻上任后,致力于路政,以“铁路创建、中国无所仿式。……兹事非游历考览,不足为功”,商与锡良,被奏派赴美国考察。到美后,不但“详查轨政得失及集资要领”,于风俗、政教、学校、工业,亦在考察之列,且探求其利弊及富强之因。返国至京师,各部交相荐举,胡峻“皆力辞自引而罢”。旋急回成都,首建铁路改归商办之策。由于四川绅商的一再要求和全国范围内收回利权运动的开展,锡良不得已,在1907年3月4日奏报:川路公司遵商律改为商办川汉铁路有限公司,举胡峻为副总理。1908年1月,清廷改派胡峻为驻川总理。他以羸弱之身,担负全省铁路、学务之重任,日夜操劳奔走,经常废寝忘食而在所不辞。

胡峻早年虽怀救国之志,但其思想囿于改良。随国是日非及民族危机的加剧,他渐趋激进,常常为国人“陈说时局忧危,勸以捐私爱公、团结救国大义,更勉学子以民族思潮。”从美国返国途中,在日本东京加入同盟会。到上海后,经同盟会员邓家彦介绍,与蔡元培等人“深相契合”。1907年秋,熊克武、张培爵等革命党人,密谋在成都起义,因事泄而失败。黄方、杨维、黎靖瀛、张治祥、江永

成、王树槐先后被捕,熊克武等人也被通缉在案。在事态严重、人心惶惶的紧要关头,胡峻首先挺身而出,并邀集老翰林伍崧生等人,代表省中士绅要求当局宽大处理;又亲向护督赵尔丰陈述利害,使被捕诸人免遭杀害。

1908年,川督赵尔巽奉命设咨议局

筹办处,胡峻出任协理,负责筹建工作,备极辛劳。1909年2月21日,因积劳过度,心力交瘁,咯血不止而去世。

胡峻工诗文,在京时所写落叶诗曾传诵一时。生前所记日记,毛发细书,精整不苟,9年中积数十册,定名为《苍霞阁日记》,流传于世。

郑钦安

郑钦安,名寿全,字钦安,以字行,1824年(清道光四年)生,邛州(今邛崃县)固驿镇人。其父郑本智,以训蒙为业。郑钦安为独子,5岁即从父读。稍长,博览群书,年16已读完四书五经,随父迁居成都,学医于一代通儒兼名医刘止唐。遵其教导,熟读《内经》、《周易》、《伤寒论》诸书,以明人身阴阳合一的道理及张仲景立法立方的要旨。24岁时,开始在成都行医。

郑钦安在师承刘止唐的医学理论与经验基础上,复博览古今医书70余种,取其所长,不断在医疗中实践总结,医理、医术日精,踵门求治者应接不暇。中年以后,在成都医林中已脱颖而出,独树一帜,为人治病,坚持用《伤寒方》治疗,临症善用四逆汤辈补命门衰火,用姜、桂、附等大辛大热药味逐阴翳浊寒,用量大而准,因治愈不少群医束手之重症、急症而名震一时,被尊为“火神派”首领,有

“郑火神”之誉。郑钦安同时也善于补阴、精于白虎、承气诸方,所用药品亦有寒凉的大黄、黄连、石膏。

为将其医术传于后世,郑钦安除诊病外,开始授徒讲学,著书立说。1869年(清同治八年),刊行《医理真传》4卷;1874年(同治十三年)刊行《医法圆通》4卷;1894年(光绪二十年)刊行《伤寒恒论》10卷。三书各具特色,切合临床应用,故皆不胫而走,风靡西南地区,为研习“伤寒”医家视为济世活人之鸿宝。

《医理真传》除综述中医学基本理论知识外,着重于治病先辨阴阳。他在自序中说:“医学一途,不难于用药,而难于识症。亦不难于识症,而难于识阴阳。”并列举数十条目,详论疾病的内因、外因、阳虚、阴虚、病情实据及用方用药。该书中心论点则谓人身以元阴、元阳为立命之本,而以阳为主导。书中既有辨认一切阳虚症法,亦有辨认一切阴虚症

法,皆各列专卷。

《医法圆通》仍本治病注重阴阳实据及处方活法圆通妙用之旨,“采取杂症数十条,辨明内外,判以阴阳,经方时方,皆纳于内,俾学者易于进步,有户可入。”书首《用药弊端说》举出当时医界积习及错误,而示以用药准绳。又说:“病家好贵恶贱,以高丽参、枸杞、龟、鹿、虎胶、阿胶、六制地黄、鹿茸等品,奉为至宝,以桂、麻、姜、附、细辛、大黄、芒硝、石膏等味,畏若砒毒。由其不知阴阳虚实至理,病之当服与不当服耳。病之当服,附子、大黄、砒霜,皆是至宝;病之不当服,参、芪、鹿茸、枸杞,都是砒霜。无奈今人之不讲理何!”书末更指出善于圆通运用成方,一方即可治多种疾病,如四逆汤一方善用,即可治愈 20 多种疾病。其中颇多独到之处,条分缕析,为他书所未论及。

《伤寒恒论》一书,其特点不泥于前人陈说,而是紧密结合临床实际,详释方义,析微阐奥,质疑辨误,独抒己见,对原书提出多处纠正。

郑钦安一生注重医德,诊病不分贫富,一视同仁。又常向贫苦百姓送医施药,济困扶厄,深受百姓爱戴。辛亥革命(1911年)前,病歿于成都,葬于成都南门外红牌楼钟家坎。

在 1981 年北京召开的中、日《伤寒论》学术讨论会上,北京中医学院教授、著名中医学家任应秋,在所著《研究伤寒论流派》一文中认为,郑钦安与曹颖甫、恽铁樵、陆渊雷等同为近代具有代表性的伤寒学家,肯定其在中国医学史上的地位。云南中医学院院长吴佩衡、成都中医学院吴棹仙等俱受其影响,德阳名医卢铸之为其高足。

钟云舫

钟云舫,名祖棻,自号铮铮居士、落二居士。江津县(今江津市)人,生于 1847 年 9 月 17 日(清道光二十七年八月九日)。1867 年举县学第一,补廪生后,设馆授徒历 20 余年。他才思敏捷,博通经史,工诗文、词曲,尤擅楹联。为人刚直不阿,嫉恶如仇,常以诗联针砭时弊,笞挞贪官。

清光绪年间,江津县令朱锡藩颀顶

贪婪,与巴县县令张铎圈占津邑后八景之一的莲塘修葺遗爱祠,为自己树碑立传,荒芜良田数十亩。钟云舫作诗文、对联予以嘲讽揭露。朱恼羞成怒,罗织罪名欲加迫害。钟云舫被迫远走成都避祸,靠卖文为生。著名的成都望江楼崇丽阁 212 字的长联即于此时写成。对联悼古伤今,激昂慷慨,烟云满纸,把满腔愤懑尽情宣泄,一时传诵全川。

朱锡藩卸任后,钟云舫始得返回江津。1902年,江津县令武文源任意篡改粮章,加租加征,激起民愤。举人张泰阶联络士绅,联名上控武文源苛征钱粮等劣迹,钟云舫参与起草诉状。时川督岑春煊正行文整顿吏治,故此案武文源败诉,县民鸣鞭放炮,唱戏以祝。次年,岑春煊调任两广总督,由水道过江津,武文源又大受斥责。武疑系张、钟所致,便重贿已升任重庆府尹的张铎,张亦深恨钟曾揭其劣行,于是上禀帖为武辩解,诬钟“受贿百两写呈文”、“煽动闹粮”等,将钟、张二人解押到成都质讯,拘禁于成都府巡检司待质所。钟云舫屡次上诉,但府衙既不审问又不结案。钟悲愤万分,在狱中作《拟题江津县临江城楼》联,该

联共1612字,为国内第一长联。这副楹联将神话传说、历史与现实相融合,气势恢宏,对仗工整,用典贴切,享誉当时。

钟云舫被囚3年,至1906年才被交保释放。1908年,与他先后冤拘成都待质所的同乡、革命志士卞薰被害于狱中,钟云舫怆然作挽联:“这千年沉渊堕海之冤,化为白气冲霄汉;余一把抢地呼天之泪,洒向朱棺涌血河。”对清廷进行了血泪的控诉。1911年2月28日(宣统三年正月三十日),钟云舫在江津去世。身后,由其门人辑注其诗文、对联成《振振堂集》8卷刊行,收有对联1851幅。另还著有《招隐居传奇》2卷、《火炕莲》1卷行世。

吴之英

吴之英,字伯裼,号西蒙愚者、渔父、老愚,名山县人,生于1857年(清咸丰七年)。祖父吴文哲、父亲吴铭钟都是饱学之士。吴之英幼承庭训,8岁即能治文辞,15岁参加雅州府试,名列第一。

1875年,吴之英以茂才第一批入选成都尊经书院,师从王闿运。他在书院中刻苦攻读,博览群书,对经史词章都有较高造诣,尤精‘三礼’,工书法,善骈文。与井研廖平、绵竹杨锐、富顺宋育仁被誉为院中四杰。王闿运曾称赞他:“诸人欲

测古,须交吴伯裼。之英通《公羊》,精‘三礼’,群经子史,下逮方书,无不赅贯。”

1882年,吴之英以优贡入京朝考,名列二等。回川后,受聘在资州艺风书院任教,与宋育仁、廖平等同为讲习。1887年主讲简州通材书院,“以治小学,通经术,习词章三者,启迪后进,时历四年,县中文风为之一变。”1892年,任灌县训导,继兼成都尊经书院讲习。《灌县志·政绩记》载:吴之英“为人和易而峻

洁,学尤深邃,卓然成家,迥迈流俗。居官廉介,训迪学子,文行兼备,获益者多,盖不徒以言教也”。时,吴虞亦从其学习诗文,“侧闻绪论,始知研讨唐以前书”。

1898年,宋育仁长成都尊经书院,引荐吴之英、廖平为书院都讲。同年春,宋育仁在成都发起组织“蜀学会”,鼓吹维新变法,吴之英为该会主讲,并同宋育仁、徐昱等用学会名义创办了《蜀学报》,吴之英任主笔。通过该报的宣传,以开通全省风气,推动变法维新。吴之英先后发表了《蜀学会报初开述议》、《学会讲义》、《矿议》、《赋役篇》、《政要论》、《救弱当用法家论》等文章。在撰文中,他以饱满的爱国热情,针对清廷在政治、经济等方面的弊端,提出了革新内政奋发图强的变法主张。9月21日,慈禧太后发动政变,“戊戌变法”宣告失败。“蜀学会”被取缔,《蜀学报》被查禁,宋育仁被罢黜解职回京赋闲,吴之英亦因此受牵连。当杨锐、刘光第等“六君子”在北京被害的消息传来时,吴之英悲愤万分,写了一首长达900余字的七言古体长诗《哭杨锐》,用以表达自己对先烈、对故友的哀思、怀念和景仰。

经过这场惊涛骇浪之后,吴之英逐渐消沉下来,产生了“因感莼鲈思旧乡,挂冠我逐归鸿去”的退隐田园、不闻政事的思想,回到灌县原任,转而悉心研究岐黄之术。他通读了《内经》、《难经》等医籍,并根据自己的体会,写成了《经脉分图十二图》、《会经文次三十八论》。

1901年,清廷同帝国主义国家签订了丧权辱国的《辛丑条约》。吴之英深为愤慨,写下了长诗《颐和园歌》,怒斥慈禧的卖国行径。同年,他“泪随肠转,回到家乡”,一面侍奉老母,一面闭门著述。同时,将30年来各个时期所写的诗、词、歌、赋、碑、赞、记、颂、诔祭、书信、论文进行了整理汇编,一一宛转披陈,亲自抄订。他说:“山林枯槁之士,民守一介,非持世通材也。若世不我与,托空言焉,所以信于后世也。”

1908年,吴之英出于为桑梓育才益世的思想,出任名山高等小学堂校长,继而乡人推举为县教育局会长。1910年,四川提学使赵启霖在成都设立存古学堂,吴之英受聘讲授词章之学,为振兴国学,培育蜀士,呕心沥血。后,刘师培在《国学学校同学录序》中说:“前清宣统二年,四川总督请于朝,则设存古学校……于是,耆德故老吴之英、廖平之伦,潜乐教思,朝夕讲习,善诱恂恂。”

辛亥革命后,大汉四川军政府设立枢密院,廖平为院长,吴之英为院士之一。1912年初,枢密院改组为国学院,聘吴之英为第一任院正(院长)。国学院以“研究国学,发扬国粹,沟通今古,切于实用”为宗旨。吴虞后来回忆当时情景时说,“国学专校,创自民国。其时吴伯瑚师,廖平前辈,刘申叔、谢无量诸公,聚于一堂。大师作范,群士响风,若长卿之为师,张宽之施教,蜀才之盛,著于一时。”1913年,吴之英因体弱多病辞职,

临行时捐赠薪金大洋 900 元,资助学院办学。回乡后,又以多病之躯,继续担任本县高等小学校长,并从事自己著作的整理。

为纪念辛亥保路死难英烈,1913 年四川人民在成都少城公园建立一座具有历史意义的丰碑。特请当时四位著名书法家吴之英、赵熙、颜楷、张学潮各以不同字体书写“辛亥秋保路死事纪念碑”十个大字镌刻于碑上。碑身东面的草篆体的字迹,即为吴的亲笔。

1918 年初,县中议修县志,吴之英粗举凡例而尚待入细时,于是年夏病逝。

乡人特在县城西乡的梨花岗树立了“伯竭先生教泽碑”以垂后世。

吴之英著述颇丰,有遗著《寿栋庐丛书》刊行于世,包括《仪礼奭固》、《礼器图》、《礼事图》各 17 卷,《周政三图》3 卷,《汉师传经表》1 卷,《天文图考》4 卷,《经脉分图》4 卷,《文集》1 卷,《诗集》1 卷,《卮言和天》8 卷。此外,已散失的著述有《诸子通侔》15 册,《中国通史》20 册,《公羊释例》7 册,《小学》4 册,《以意录》4 册,《蒙山诗钞》1 册,《北征记概》一册。

傅樵村

傅樵村,又名崇渠,简州(今简阳县)周家场人,1873 年(清同治十二年)生(一说 1875 年生),因迁居成都较早,常以成都人自居。其父傅廷玺系清道光年间举人,曾任江安县教谕。傅樵村早年以童子试第十名入学,应赋试榜列第二。他从 23 岁开始,先后写出《春秋分目》(14 卷)、《麟经类考》(48 卷)、《西域古今沿革图考》、《西安防务险要考》、《中西新学提要》、《中外商务丛钞》(100 卷)、《考订长江水道图》等。

1898 年,傅樵村肄业于成都尊经书院,在书院山长宋育仁所办的《蜀学报》中担任采访,他受宋育仁维新思想影响

较深,痛感国家要救亡图存,必须效法欧美和日本,提倡科学,振兴实业,革除时弊,开通民智,他决心致力于宣传教育,以唤醒民众。

1900 年,傅樵村在成都桂王桥北街创办图书局,出版书籍、地图。同年 12 月 6 日他与算学报馆总教习苏星舫创办《算学报》,因销路不畅很快停刊。他并不灰心,次年又创办《启蒙通俗报》,当时,民众文化水平普遍不高,认字的人不多,报纸是刚出现的新生事物,人们还没有看报的习惯。傅樵村在《启蒙通俗报》出版以后,还代理北京、上海等地的报纸。随后,二酉山房,算学书局,安定书

屋等处也仿效傅樵村代办京沪等地报纸,中外各报始畅行成都。傅樵村的图书局还设立了两处阅报公所,预备了数十样报章,供人们阅读。

1903年,傅樵村到日本大阪参观“万国博览会”,他在会上购买了“中国读史大地图”20幅,以及誊写板,真写五色板等,带回四川,从这时开始,成都地区开始印刷彩色印件。

1905年,傅樵村被委任为“彩商会议所”商董,开办“富记彩票行”,承销彩票。

1906年,傅樵村又在图书局办了印刷公社进行石印和铅印,他还将《启蒙通俗报》改为《通俗日报》,每天出1张半,他自己从事编辑。1909年,傅樵村又创办了成都第一家画报——《通俗画报》,这样,使不识字或识字不多的人也能从报刊上获得一些知识。同年,商务局总办沈某委托傅樵村办东洋车行业,傅氏于是在福德街创立“工业馆”,雇木铁匠100余人,制作了100余辆东洋车(即人力车、黄包车)。最初,四川总督不许洋车在市内行驶,只能沿城墙边的道路行驶,但一两年后,东洋车即遍行成都城内。

1911年,傅樵村赴湖北期间,《通俗画报》因鼓吹保路运动,于7月被清廷查

封。10月初,傅樵村返川后,恢复了《通俗画报》的出版,并鼓吹民权,不久又因遭兵乱再度被迫停刊。次年6月,又以合资形式复刊,傅樵村任编辑和绘图员。

傅樵村一生最重要的著述是《成都通览》,他收集了有关成都各方面的资料,一人独自写成此书,1909年9月出版第一册,次年出齐。全书共8册,约30万字,以志书体例成书,内容极为丰富,包括成都的地理、沿革、气候、河道、场镇、学校、工商、农业、邮政、古迹名胜,物产、民俗、方言、儿歌等,是研究清末成都社会历史的重要文献。

傅樵村因经营彩票不善,经办彩票发行的人又从中舞弊,造成“富记彩票行”的严重亏损,当时,成都知府王棧之弟王羨门设下圈套,逐渐将他的印刷公社吞并,他的报纸和所办的学堂也随之停办。

1915年,傅樵村离开成都到松潘赴任知事,他徒步而行,沿途查访,到任后,他又考察民情风俗,名胜古迹,写出了《松潘游记》一书,不到一年傅樵村即离任回成都。他担任过成都红十字会长,1917年,川、黔军阀成都混战后,百姓死伤甚众,傅樵村负责赈济工作,事后还出过1本画册,由他作序。1919年秋,傅樵村逝世于成都。

周达三

周达三,名永德,华阳(今成都)人,1856年(清咸丰六年)3月28日生。

明清之际,四川连遭兵燹,经济文化备受摧残,出版业濒于灭绝。清乾隆年间才有江西籍书商陆续来成都开业。其中周达三之祖父周舒腾(江西金溪谷人)在学道街创设的“尚友堂”是最早的一家,主要经营江浙刻本的经、史类书籍及丛书类。生意兴隆,颇受成都读书人的欢迎。随后周达三之父周承远也在同一街上开设一新书店“九思堂”。其时周家家境宽裕,使周达三从小就有一个较好的读书环境。

清同治初年,周家开在学道街的“尚友堂”和“九思堂”皆因一场大火毁于一旦,从此家道中落。少年周达三只得弃学从商,于1866年在其父的学徒王述斋开设的“志道堂”学习书业。他对目录版本学颇下功夫。张之洞任四川学政时,创办尊经书院,聘著名版本学家缪荃荪来成都协助编纂《书目问答》。周达三趁此良机向缪荃荪求教,受益不浅,学问猛长,目录版本知识在成都同行中首屈一指。加之他待人谦恭有礼,因此文化界人士特别是尊经书院师生多乐于与他交往。“自光绪五年至二十六年,凡隶‘尊经’籍者,无论先后皆从达三游,自旦至暮宾客常满。”

“志道堂”在周达三经营下业务发展顺利。数年后,王述斋又在学道街另开“志贤堂”和“翰缘堂”两书店,“志道堂”改名“志古堂”作总号,全权委托周达三负责经营。

“志古堂”在周达三主持下,出书500余种及10种发蒙初学教科书。因其选题谨严,校勘精细,印装质量讲究而声誉较高。大型丛书《玉海》和《十七史商榷》、《劝学篇》、《读史方輿纪要》、《天下郡国利病书》、《盛世危言》、《文史通义》、《湘军志》等等都是由周达三本人亲自校勘后出版的书。“志古堂”所出版的书籍多与张之洞在尊经书院提倡的尊经、读史、通小学的精神相一致,因此,备受尊经书院师生青睐,张之洞见“志古堂”所出书籍质量上乘,便资助周达三银子300两让其校刻难度较大的“说文解字”。周达三如期高质完成,这部书在学院考试期间,广为传用,“志古堂”名声亦与日俱增。周达三还为总督吴棠监刻“望三益斋”(吴的斋名)本《韩诗外传》和《杜诗镜铨》两书,皆以校刻俱精而闻名于世。

戊戌变法期间,“志古堂”顺应历史潮流,出版了一批康梁著作及《盛世危言》、《劝学篇》等鼓吹变法图强的书,在青年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。吴玉章在回

忆录中写道:他当初之所以“成为康梁的信徒,一心要做变法维新的志士”,就是因为读了“志古堂”出版的有关康梁论著的新书。

“志古堂”在周达三的苦心经营下,业务发展迅速,由原来的一家平常小书坊,发展为有职工 70 多名,具备较强的校勘、刻印、发行能力,在省内居于大型出版书店之列。

周达三不慕虚荣,淡泊名利。所生四子以诚、廉、朴、谦四字取名。并以“刻己为俭,俭人为刻”教子。他经营“志古堂”半个世纪,“为肆重致富数万金”,但在经济上一清二白。光绪年间刘秉璋任四川总督时,其幕友力劝周达三纳资捐官,被他婉词谢绝。民国初年,政府欲授予他荣誉职衔,他坚辞不受。

清末周善培任四川劝业道,锐意改

良,创设成都总商会。他登门恭请周达三出任商事裁判职,周达三任职 10 年,尽力调处商界纠纷,力求公平合理解决。至他晚年以德高望重被总商会推为会长。

周达三长期任“志古堂”经理,言传身教为木书业培养了不少人才,这些人分布在木书业各店和高等学校,形成一支骨干技术力量,较有成就者如袁西坪、汪德久、陈怀清、黄致祥等。黄致祥 1930 年开设“茹古书局”,继承了周达三优良的作风,形成了自己的风格。

周达三于 1922 年 10 月 27 日病逝。生前好友、著名经学家廖平为周达三撰写了墓志铭,文中写道:“此三十年蜀学之盛比于齐鲁,虽诸贤之自立为不可及,而达三补苴提挈之功不可没也。”

黄吉安

黄吉安,名云瑞,别号余僧,祖籍安徽寿春,1836 年(清道光十六年)生于成都。早年应童子试,30 岁以前曾在军营中做文书,后在一些县衙任幕僚。1896 年,他因不愿与县令同流合污,从璧山县衙离职回到成都。

黄吉安辞职回乡后,潜心于戏曲创作,他最初是写扬琴曲本。当时成都的北派扬琴艺人因上座率差,生活十分贫

困,黄吉安常将自己新编的曲本赠送给他们,演出后,颇受听众欢迎。后来,南派扬琴艺人也争相采用黄吉安写的曲本,使两派技艺特长互为增辉,发展了扬琴艺术。黄吉安还将某些曲本的题材改写为川剧剧本,赠与玩友社演唱,成了当时玩友界较流行的本子。

1902 年,四川警察传习所总办周孝怀在川推行新政,改良戏曲,特聘黄吉安